

# 内生增长前提下中国中部城市化 进程路径选择和中小企业发展

黎璞, 陈晓红

(中南大学商学院, 湖南长沙, 410008)

摘要:中国近年来的需求不足主要原因是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二元结构,而小城镇的发展战略决定其只能在低水平取得均衡。中部崛起的路径选择应是积极发展区域中心城市或城市圈,以城市化中部地区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要注意要素聚集功能的建立。但这一过程不能由政府大规模投资来推动,否则会出新的结构失衡,城市化的内生增长动力在于分工网络的完善,这也是中小企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在内生增长前提下,发展中小企业是中部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关键词:中部崛起;内生增长;城市化;中小企业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5)03-0294-06

目前中国已进入重化工业和城市化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可持续,中部地区如何尽可能地跳出一放就热、一抓就死的这一经济循环,则需解决资源约束和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等问题。以往的增长方式已日显弊端,作为中国的中部地区,如何在内生增长的前提下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协调发展,实现中部崛起战略,就面临着一个重要的路径选择问题。

## 一、二元结构导致的低水平均衡陷阱

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也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经典的城市化理论认为,城市化可为工业化提供外部经济效应和聚集效应,并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但这有赖于社会分工的深化和产业链延长<sup>[1]</sup>。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与城市化进程是统一的,发达国家在1820~1950年间,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相关系数达到0.997<sup>[2]</sup>。

然而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过程却存在着二元结构,两者发展并不协调。中国的早期工业化过程是对社会复杂分工的模仿过程,这种迅速工业化过程不需要城市化的同步演进,因此从一开始中国的工

业化和城市化就存在某种程度的脱节。同时这种资金密集型工业体系,限制了对劳动力的吸收,只有采取城乡隔离的措施,才能保证工业体系中劳动力供需的平衡,因此1978年前中国城市化远落后于工业化是计划经济中的理性选择。经济体制改革后,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工业化和小城镇建设再次抑制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如同企业的发展,城市的建立也是降低交易费用的自发秩序过程,工业化带来了产业结构的演变,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多元和高度分工,这种产业链延长和分工深化的标志就是第二、三产业的规模和比重超过第一产业,而二、三产业都需要人口的集中来提供劳动力和市场,因此人口的聚集产生城市 and 由此而来的聚集效应是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化的内生增长动力。在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下,市场会根据城市提供的交易效率提高带来的边际收益和人口拥挤带来的环境恶化等边际成本均衡时,决定城市的最优规模和层次结构。

经济发展理论中关于城市化模型主要有刘易斯和托达罗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而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一直滞后于工业化,主要忧虑于人口庞大的国家将出现“城市病”,因此城市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人

收稿日期:2005-05-20

作者简介:黎璞(1972-),男,长沙人,中南大学讲师,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中小企业理论;陈晓红(1963-),女,长沙人,中南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中小企业理论。

口转移与托达罗模型极为吻合,然而托达罗模型的政策含义是强调农业部门和农村发展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农村就业的积极意义和可行性,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些反城市化措施造成中国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遭遇“低水平均衡陷阱”<sup>[3]</sup>。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布局造成资源配置的分散,企业因距离远和基础设施差而无法进行分工协作来降低外生交易费用,造成交易效率低下。农村经济和人口不能实现空间上的聚集,相应的产业结构必然是低水平的,农民收入在初期改观后很难有持续性的提高,抑制了国内需求。沿海的外向型加工业亦受制于此,每年的“民工潮”的直接原因是沿海收入或机会高于中西部,但资本应向低工资地区流动,这也是沿海地区吸引投资的原因,但内地的低城市化水平无法产生资本和信息的聚集,造成劳动密集型企业并没有向内地转移,影响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地区差异也进一步扩大。因此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布局只能在交易效率较低时形成均衡,无法容纳更进一步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分工深化,否则就遭遇发展瓶颈和结构失衡。因此本文认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长期低谷运行和回升无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低水平均衡陷阱造成的国内需求不足的结果。

## 二、中部城市化道路的选择

根据钱纳里关于人均收入和工业化阶段理论的划分,中国已处于准工业化时期的第四阶段,即已是工业化的前夜<sup>[4]</sup>。但按钱纳里的标准模型,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并不协调,“该模型显示,工业化率在37.9%时,城市化率为65.8%。中国1971年工业化率为38.2%,城市化率为17.3%。1992年中国工业化率与1971年相当,城市化率为27.6%”<sup>[5]</sup>。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也指出,1995年中国人均GNP620美元,城市化水平为30%,同年人均GDP500~730美元之间的11个国家城市化平均水平42.5%。按PPP计算中国人均GNP为2920美元,同年人均GNP在2000~3800美元(PPP)之间的19个国家平均城市化水平为50.8%。截止2003年底,中国仍有7.7亿的乡村人口,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40.53%,中国市长协会组织编撰的《2001-200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预测,到2050年,中国城市人口总量将达到10至11亿,即从现在起,中国每年将有

1200万农民转为城市人口。据天则经济研究所估算,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还将以每年2000~4000万人增长,到2010年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0%,正常城市化水平速率对经济增长贡献是2个百分点左右。而根据法国百富勤估算,城市人口将在2012年超过农村达到8.18亿,达到全国的57%。

根据世界城市化的“S”型曲线规律(见图1),城市化进程分为以下3个阶段:城市化率由0提高到25%为城市化的初级阶段,也是城市化的缓慢发展阶段;城市化由25%提高到75%为城市化的中级阶段,其中城市化由25%提高到59%为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城市化达到75%以后为晚期阶段,也是城市化的稳定阶段。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为40.53%,恰好位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

图1 世界城市化发展的“S”型规律曲线

应看到城市化将是中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可抗拒的经济发展规律。因此,未来我国城市化有着强烈的内在需求。

而作为我国中部六省,城市化水平更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91~2001年,全国城市增长平均速度为3.82%,中部为2.48%。据2001年统计数据显示,中部每1000万人口拥有的城市数为4.5个,这一指标全国平均为5.2,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分别为5.2 5.5 6.7;中部每百万平方公里拥有172个城市,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分别为222、364、289个城市,中部城市密度明显偏低。从1990~2002年,全国城市化水平年平均增长1.0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年平均增长1.0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较高的湖北省(41.35%)与城市化水平最低的河南省(24.4%),差距达到16.95个百分点。

中国现有的城市发展规划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前面已分析这种规划将使中国经济陷入“低水平均衡

陷阱”。史晋川和潘士远比较了国内外城市边界和规模的研究后指出,以往认为城市规模增长而导致无效率的观点并没有考虑政府官员的自利行为,在考虑官员的自利行为且官员掌握着配置资源权力而建立的地区模型显示,自利的政府会选择偏小的城市规模,且不愿小城镇合并,拒绝共享基础设施和“聚集效应”,从而导致社会福利的丧失<sup>[6]</sup>。

从城市化进程的内在规律和世界发展趋势来看,中心城市和城市圈能起到一个地区中心的作用,并且大城市的快速发展是各国城市化进程的共同特征,以人口、经济和文化高度集约的大城市,其聚集效应可以为工业化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分工深化,完善产业链,则能进一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这对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农村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都有着重要意义。本文认为,目前大家所关注的“中部塌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部地区缺少具有经济启动作用的中心城市,而遭遇“低水平均衡”陷阱,造成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因此对要实现“中部崛起”战略的中部六省市而言,崛起之路在于以快速而健康的速度建立起区域中心城市或城市圈,起到在该区域中的中心辐射和经济支柱作用。中心城市的重要性在于“市”而不在于“城”,即中心城市的功能建设,如要素聚集功能的重要性要大于城市的规模扩张。另外,城市规模越大,就意味着用户基数越大,日常利用频度较少的服务业、较特殊的服务业只有在大城市中才能得以生存。因此,只有在大城市,门类齐全、高度配套、分工细致、功能明晰的服务产业才会有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对于城市化水平尚低的中部地区而言,目前大力发展小城镇,则因没有规模效益,而无法发展高度社会化分工的第三产业,吸收农村转移劳动力。

钱纳里称,经济发展就是经济结构改变的过程。在中国已基本建立起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前提下,加快城市化进程也就意味着经济结构的改变,但经济官员的自利行为和“低水平均衡”陷阱成为城市化的瓶颈,中部快速建立区域中心城市也就面临着政府主导投资的外力推动和市场主导内生增长的路径选择问题。

### 三、外生强制增长的弊端

在持续几年的通货紧缩,政府以积极财政政策刺激市场需求后,从 2003 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又

出现过热的势头,有人认为是工业化过程加快所致。但姚枝仲通过对中国近 20 年来 GDP 增长率、投资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的研究,得出近几年的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源自政府主导投资下的城市化进程加快的结论<sup>[7]</sup>。考虑到中国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那种城市化进程加快应能优化经济结构,但这种外生增长为何会导致结构进一步失衡,而引发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出台,这就需要考察外生增长的实际效果。

通过对原材料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发现,钢铁消费增长率从 2001 年开始连续三年攀升,但 GDP 的增长仍保持在 7%~8%。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则与原材料的消费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要明显得多,钢铁的消费增长率几乎和固定资产投资率保持一致,证明固定资产投资率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外生增长因素。

在不考虑技术进步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源于资本存量(K)的增加和劳动力投入(L)的增加。这两项要素投入的增加,必然导致经济的增长。按最简单的 C-D 函数关系,  $Y = AK^\alpha L^{1-\alpha}$ , 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意味着资本存量(K)增加,而且中国这几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率是一直在增加,但经济(GDP)的增长却基本保持稳定,刘金全和王大勇对 1997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统计结果显示,实际 GDP 的平均增长率为 7.84%,最高速度为 8.8%,最低速度为 7.10%,波动标准差仅为 0.63%<sup>[8]</sup>。经济增长围绕着 8%左右稳定地徘徊。根据上述函数关系,在 Y 增长率不变时,就有可能是发生资本替代,劳动力投入减少,但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显然是非理性的,政府每年制定的 GDP 增长率 7%以上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增加就业人口,保持就业率的稳定。中国的国情决定了经济增长中劳动投入(L)的增加是必然选择,这就意味着 K 的产出率在降低。

在经济改革后,特别是近几年,GDP 的增长成为考察各级政府政绩的硬指标后,各级政府依靠财政拨款配之以银行贷款,大量投资土木工程项目,以营造需求,间接地推动经济增长。这种强制性增长引致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是与工业化相关性不大的城市化过程,最直接的可观察变量是固定资产投资,其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占相当大的比重。城市化对工业化的促进有赖于社会分工的深化,需要相关的第三产业发展来吸收农村劳动力并提供工业品的市场。但由于中国经济强制增长机制,各级政府在选择上主要考虑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

促进作用或各种形象工程,当政府大规模投资于基础设施与房地产如大量的开发区建设与城市扩建,其高投资率的主要作用在于维持经济稳定的增长率,却不能带动多少消费需求。因此政府主导的城市化进程并不能给工业化提供多大的促进作用。

外生强制增长导致各经济环节中价格传导机制以及投资扩张—供给扩张—消费扩张循环出现断路。经济的健康增长需要合力,单向度的推动极易使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增加,外生增长的城市化进程就是一种单向度力,只产生对原材料能源的需求,而对制造业的刺激相对微弱,无法带动和承载工业化。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城市化不但不能改善产业结构的现状,反而强化了目前的结构性弊病。这就意味着中部地区城市化只能选择内生增长途径,但这种内生增长动力源自何处?

#### 四、城市化与中小企业发展

中部要实现“崛起”,建立中心城市或城市圈,前面已论证外生强制性的推进城市会导致无效率,而内生增长意味由市场起主导作用,那么市场的微观主体——企业在城市化进程中又是如何演进的,是否意味着要500强之类的大企业来主导城市的产

业,以推动持续城市化?中部地区是否要超常规发展一批大企业和大集团?Simon和Nardinelli对186~1961年间一组英国城市数据的经验研究表明,企业的大小和城市的大小不存在正相关关系<sup>[9]</sup>。

从图2可以看出城市化给工业化带来专业化程度提高和分工细化的影响并引起组织结构的变迁。企业边界的界定在于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的均衡,因城市的聚集效应有利于分工深化,分工通过产品和服务市场在企业之间发展,随交易效率的提高,则每个企业越来越专业化,不同专业的企业种类增加,企业规模缩小,而生产力上升。因此城市化以及建立中心城市或城市圈与中小企业的发展并不矛盾,且两者存在着相互促进作用。这主要表现在:

(1) 城市化为中小企业提供市场和需求。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发展所形成的聚集效应使工业化对城镇化产生直接和较大的带动作用,而当工业化接近和进入中期阶段之后,产业结构变化和消费结构升级的作用超过了聚集效应的作用,城市化的演进不再主要表现为工业比重上升的带动,而更多地表现为服务行业比重上升的拉动。城市化可以创造出持久增长的国内需求,农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其消费由自给性消费占较大比重转化为完全商品性消费;城市居民能够

图2 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互动

获得比农民更高的收入,因而可以有更多的消费支出,城市居民的消费环境比农民优越,消费领域比农民更广。同时,人口和经济活动在城市集中,还创造出对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抑制国内需求的“低水平均衡”只有在城市进程中才能突破。

(2) 中小企业提供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就业空间。中国的特点在于前面已进行了相当长期的工业化过程,大型企业由于技术不断升级和资本有机构成逐步提高,就业机会的增长率很低,对低技术能力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几乎不存在需求,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将为这部分转移劳动力提供广大的就业机会。在城市化过程中,人口的聚集和随之而来的对文化、娱乐、餐饮零售等需求为第三产业的爆发增长提供了一个临界点。在这些行业中中小企业被证明是最有效率的产业组织,其健康发展又为城市化提供了持续动力。

(3) 城市化为中部中小企业产业升级提供了机会。中部地区因经济欠发达,中小企业多以乡镇企业为主,这部分乡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受制于“低水平均衡”陷阱。中部在没有建立起能聚集信息、资本和人才的中心城市之前,沿海资本和产业就不会向中部转移,若建立起中心城市,并放松对乡镇企业的选址限制,中部地区的低成本优势必然会吸引沿海的资本和产业向该地区转移,中部的中小企业将得到资金投入和产业升级的机遇,进而促进所在区域的发展,中部和沿海的地区差异也将随之缩小。

(4) 中小企业能优化城市产业结构,降低周期性波动。作为一个区域中心城市若主导产业为一两家大企业所控制,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将产生较大的波动,从宏观环境而言,作为一个新兴加转轨的市场,中国的经济增长既是一个经济周期和结构调整并存的过程,又是一个行政干预和市场内生的综合影响体。在市场化 and 体制改革尚未到位的情况下,体制缺陷和自发秩序的博弈将持续下去,从而也就决定了投资总是陷入不足和过度的不良循环中,因此,一放就热,一抓就死的波动反复也就成为中国经济的特有现象。而在微观环境上,经济的内在周期和企业的发展过程中的风险,都可能使企业迅速衰败,其所在的城市的经济发展就可能减慢甚至中止。在这一点上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发展过程有很现实的借鉴意义。台湾和韩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如相同的资源禀赋,自然资源缺乏但拥有高素质的劳动力,内部市场小而要发展外向型经济,社会人文环境也相同,都受儒家影响。但不同之处在于,台湾

以中小企业为主,而韩国则是大集团主导。在20世纪80年代,韩国前十大企业的产值占韩国GDP的75%,而台湾的最大的八大企业的产值仅为全地区GDP的15.3%,韩国企业平均雇员数为68.8人,台湾则为34.6人。不同的产业组织结构抵御风险的能力大相径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人均GDP减少一半,1998年转为明显负增长,而台湾的增长速度仅低于1997年。其原因在于台湾的中小企业形成了完整的分工网络,涵盖各产业领域,相互之间高度分工协作,使单个很弱的中小企业,整体上却有着很强的抗风险能力。

城市的兴起和企业的产生都是降低经济活动中交易费用的组织形式,在当今中国的现实情况下,若一两家大企业支撑着区域中心城市的主导产业,则城市和企业某些功能上会重复,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而中小企业则可利用城市聚集效应的外部经济性,建立完善的分工网络,以企业群的形式获得比大企业高得多的规模效益。

## 五、结论

加快城市化进程是中部地区走出“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必由之路,但政府以大规模的基建投资,以“物化”城市的外生性强制增长却不可行。在可持续发展和宏观调控的背景下,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化战略不在于修马路,建广场和向外圈地。而应积极利用信息化的优势,因地制宜组建中心城市圈。在城市圈的演进过程中,当各城市由相对封闭转为互相开放时,物质、信息交换加快将使交易效率提高。经济的发展是交易效率提高的过程,中心城市的要素聚集功能强化后,中小企业将获得良好的发展机遇,与城市化形成良性互动,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将按城市化—分工深化—中小企业发展、产业升级—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路径走向内生增长的道路。

### 参考文献:

- [1] 杨小凯,张永生. 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 [2] 邱晓华. 论世界制造业转移与中国经济增长[D].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
- [3] 王学真,郭剑雄. 刘易斯模型与托达罗模型的否定之否定——城市化战略的理论回顾与现实思考[J/OL]. <http://www.cass.net.cn>, 2003-09-10.
- [4] H. 钱纳里,等. 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 上海:上

- 海人民出版社, 1995.
- [5] 托达罗. 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 [6] 史晋川, 潘士远. 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作用: 温州的案例[A]. 中国城市化: 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C].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
- [7] 姚枝仲. 中国的高投资率问题[J/OL]. <http://www.cass.net.cn>, 2004-07-24.
- [8] 刘金全, 王大勇. 我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风险性和波动性分析[J/OL]. <http://www.China.org.cn>, 2002-12-20.
- [9] Curtis S, Nardinelli. The talk of the town: Human Capital, Information, and the Growth of English Cities, 1861-1961[J]. *Explorations of Economic History*, 1996, 33, 384-431.

## The urbanization of Chinese midland under endogenous growt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ME

LI Pu, CHENG Xiaohong

(College of Busines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dual structure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indicates the causes of domestic under-demand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small towns determines that the economics can only be met at lower equilibrium. The route that emerges in the midland is chosen to develop the regional key cities or cities to enclose actively, but this process will lead new un-equilibrium that is pulled by the investment of government. This paper verifies that the endogenous motive force of growth of the urbanization is the division of labor, which also promote the SME. So we draw a conclusion the SME is the main force that can promote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midland.

**Key words:** emerges in the midland; endogenous growth;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SME

[编辑:汪晓]